

回顧

「荻村傳」的農村背景

林柏燕

陳紀澄先生的「荻村傳」，以中國農村背景為緯，以優常順兒的一生為經，點出時代動亂中，廣大中國農村所立刻暴露出來的愚弱。它不但是書中男主角優常順兒的悲劇，也是中國農村在政治動亂中，所經常扮演的殺人盈野，野有餓殍的悲劇區。其震撼力，重讀於二十年後的今天，猶感惘然無比。

日人藤晴光的日譯本「荻村のんびと」（東京出版，一九七四）曾介紹它是臺灣最具「爆發性」的巨著。在此以前，名作家張愛玲曾譯成英文，名為 *Fool in the reeds*（荻草中的愚人們）（香港出版

，一九五九）日譯重點在「人びと」（即人人之意）易言之，受苦受難的，喜歡使別人受苦受難的到頭來，通通是愚人村的一份子。張譯書名則比日譯尤其象徵意味。荻草是脆弱的，隨風搖擺的，加上愚蠢，更是搖擺得離奇而可憐。

張譯日譯，各有千秋，不過，由於原著用了許多土話，譯筆難免小錯，如完完蛋兒逗常順兒唱歌時，常順兒說：

「我唱，我唱！先殺共產黨呀！後殺老毛子呀！先殺王子和呀，後殺馬克斯兒。」（荻傳，二〇六頁

，重光版）日譯張譯，都把「老毛子」譯爲毛匪。日譯作：「それから毛匪を殺せ！」（二六三頁）張譯作：Then Kill Chairman Mao（一九四頁）顯然，兩譯皆不了解「老毛子」是北方土話，指的是「俄國人」。

欲深入荻村傳，最好並讀「華夏八年」與「赤地」。以故事的時間言，華夏八年，赤地皆不及荻村傳歷時漫長。荻村傳從義和團寫起，歷經清廷崩潰，民國成立，軍閥割據，日本侵華，以至土共猖虐，但由於荻傳以固定的北方農村子以濃縮，故歷時雖長，篇幅却遠不及華夏八年與赤地。

「荻村傳」，作爲「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文」的「人的文學」，它對中國農村有深入的悲憫。「赤地」，在抗戰之後，對東北易旗，大陸變色，有相當坦誠的自省意識。「華夏八年」，若作爲「戰記文學」，它並沒有充分發揮戰記文學的特色。不過，它要少也反映了堅強的抗戰意識。

我們的文藝作品，一向喜愛「庖有肥肉」，而厭惡「野有餓殍」的文學，尤其是一旦碰到需要自省與批判時，除了逃避，就是一片燭飾。

而荻村傳是一部中國農村的真正血淚史。

中國農村到底如何？雖說夏禹有治水之功，鼂錯有貴粟之論，孟子也一再頗通成本會計地在那兒「五畝之宅，百畝之田」一番，但老實說，算來算去，中國農村自古以來就是一團糟。在古籍裏，我們一再看到中國的村史，事實就是一部水災史，旱災史，逃荒史，病蟲害史，技術落後史，乏官照料史，苛捐雜稅史。朱熹「奏救荒事宜狀」云：

紹興府之饑荒，昔所未有。民情嗷嗷，日甚一日，不獨下戶乏食，而士子宦族，第三等戶有自陳願預乞丐之列者，賣田拆屋，砍伐桑柘，鬻妻子，貨耕牛。野菜草根，所掘又盡。百萬生靈，饑困支離。衣不蓋形，面無人色。

紹興府應該算是江南魚米之鄉了。再看看陸游「致曾逮書」：

東人流殍滿野，今距麥收尙百日，奈何？如僕輩，既憂餓死，又畏剽竊，日夜凜凜，而霖雨復未

止，所謂麥，又已墮可憂境矣。……

在這種又怕餓死，又怕被搶的心情之下，恐怕陸游不會再「滿園春色宮牆柳」亂填「釵頭鳳」吧。以上是發生在宋孝宗淳熙八年（一一八一）的事。（資料根據陳鐵凡著「判院討原」新社季刊五卷四期。）這些也太遠了，不妨看看滿清末年，「御史曹志清奏牒」：

直隸省差徭之繁重，甲於天下，常年雜差，民力已苦不支，去歲兵差絡繹，州縣橫斂暴徵，而民愈不堪命矣。不肖州縣，藉差爲肥私之計，胥役視差爲致富之奇，敲骨吸髓，毫無顧忌。尤可駭者，去秋水災，哀鴻遍野，皇上軫念民疾，撥款賑濟，乃聞灤州，徐亨各州縣，將賑銀扣抵兵差，聲言不足仍向閭民苛派。災黎謀食維難，又加此累，多至轉於溝壑，無所控告，是民非困於災，直困於貪吏之苛斂也。……

以上是發生在甲午戰爭前一年的事。（資料據：

呂士朋著：「戊戌百日維新的經濟改革及其影響」東海學報十卷一期）至於民國，以至於今天的大陸，人民的生活仍是苦不堪言。

看看「民情嗷嗷」，再聽聽「敲骨吸髓」，已可見大半中國。而曹史所謂「無所控告」，意即這些農民口不能言，手不能寫，欲哭無淚，欲訴無門是也。而「荻村傳」，正是以上農村諸史的綜合濃縮，外加戰亂。

「荻村傳」裏，對農村人物是這樣分析的：

「荻村這班人物和中國任何農村沒有兩樣。他們隨着時代的巨輪，踏入每一段行程，他們的遭遇雖不盡相同，但在基本性質上並沒有什麼差別。他們保守、愚蠱、貧苦、狡詐、盲昧，永遠是被支配者。然而，他們中間也有智慧、忠實和樂天知命的大眾」。

這是隱藏在作品背後的分析，等到一落入小說，它創造了這麼一個「無可控告」的典型人物——優常順兒。陳紀澄先生對它，曾這樣概說：

「優常順兒，這一個時代的玩偶，在任何齒輪上，他都扮演悲劇角色，而在他個人的尺度上，渾渾噩噩，是悲是喜，平常他自己不能十分辨得清，等到重

要骨節眼，他才覺悟了，分明了思想。他這一輩子，正代表着中國北方廣大農村的變化，每個來自田間的讀者是熟悉的；儂常順兒這個人物是農村中的可憐蟲，代表着生活在夾縫中的勞動者，他們想了一輩子，但當他被活埋時，他還希望做人！阿Q之流是沒有這種勇氣的。」

以上陳先生強調的是：農民在貧苦愚昧，控告無門之下的宿命論。這種宿命論，却牢牢地統治了他們「渾渾噩噩」，一方面也常常是一種自嘲的痛苦慰藉。從這裏分野，儂常順兒與阿Q是處理宿命論兩種不同的典型。

陳先生說：「多少年來，儂常順兒和阿Q，就在我腦海裏翻騰，……從那時起，我便計劃寫儂常順兒這一輩子，比阿Q更生動，更現實的這麼一個代表着大時代的人物。」事實上長荻村傳與阿Q正傳，都是具有中國人性與不忍人之心的雙重特色的「人的文學」。陳作出自悲憫，周作則加上嘲諷。儂常順兒是這個大時代所產生的悲劇人物，阿Q則是這個大時代所形成的人性典型。一個是渾噩認命，起糞鋤草以「常順」，一個是突梯滑稽，把命運看成「兒子打死老子

」的反嘲。一個被活埋時，還希望做個「人」；一個被砍頭時，對這個中國「人」却是不做也罷，這是一種木然。也可以說，阿Q是在中國社會之下，徹頭徹尾的絕望者。

所謂「木然」，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說：「我愛中國，我也討厭現時的中國。我愛人類，我也討厭現時的人類。……勿論是山東人，中國人，以及現時風氣中的人類，我都有點木然。」（「生命的學問」、「懷鄉」篇）這種矛盾的情懷，固然是由於拔根掛空，一再游離的結果，正如徐訐先生所說：「生活上是流浪漢，思想上是虛無主義」（見「個人的醒覺與民主自由」）但，「木然」與「熱愛」仍是無法一致的矛盾。這種矛盾在逐漸的麻木中，慢慢的變成可怕的宿命論，甚至在聲色馬殺雞，秋波加臀浪中習慣了。這是沒有「根」的生命。阿Q與儂常順兒，都是沒有根的，置之於中國的土地，却又是最根深的，但他們的根被拔斷斷傷了。不宿命，又奈何？

荻村裏「有一些人活一輩子，不知什麼是河，什麼是山。」這是愚昧，正如他們從未聽過什麼是「共和」，什麼是「民主」。即便是荻村的秀才舉人，也

算知識份子的話，大概也只能作「項羽拿破崙亦能戰」這類文章吧。儂常順兒開口閉口是「操他親奶奶的」，這是一種阿Q的憤懣。儂常順兒，厚嘴唇、貓耳朵、流涕鼻、黃板牙，是中國農村一輩子娶不到老婆，一輩子不必刷牙洗澡的長工典型。「荻村傳」除了它的文學語言潑辣利落之外，它對中國農村有相當深入的剖析與完整的結構。它的剖析，是相當理性的，而它的結構，則超越了政治的表皮，與中國農村史的發展，有其牢不可破、密不可分的結合。從「儂常順兒」，提着禿纓槍，被拉伕去參加義和團受傷逃奔到荻村，一直到被土共活埋，真是無一處不具有「爆發性」的震撼力。「天災、人禍、疾病經常籠罩鄉村」（第一一一頁）那是農村的寫照，但他們迷信、保守，還要械鬥。「兩村參加械鬥共有一千多人」（第七七頁）械鬥，在國父的三民主義演講稿裏，已指出它是「一盤散沙」的毒害。專放高利貸，甚而引誘良家婦女逼迫成姦的張五爺以爲：「任憑你世界怎麼變，可是荻村不會變。」（第一一三頁），但這個世界，已無「老死不相往來」的淨土，結果荻村變得天翻地覆。「白天是日本人的天下，夜晚是八

路的世界，集中兵力的時候，他們服從日本人，兵力分散的時候，他們聽命於八路軍，真中了小淘氣兒的話柄——好他媽的希罕」。

儂常順兒當上皇軍的班長，驍勇善戰，日本隊長誇獎他「大大的好」（協和語）。但他也學會了欺壓老百姓，強姦婦女，穿上皇軍制服，愛幹什麼就幹什麼。從義和團到皇軍的班長，是相當滑稽的，最後還當了荻村的村長，一直演的是布袋戲，當了村長，他得扭秧歌。「當年我給人家起糞的時候，我當個燈官兒，今兒個當了村長，還叫我扭屁股，這是他媽的什麼鬼道理。」（第一七五頁）但他還是扭了，還帶着比他老的「上級分發之妻」蘭兒大娘，扭成壓軸大戲。儂常順兒整肅、公審、鬧死過不少人，到頭來自己也「渾身犯下錯誤」，最後是新任村長完完蛋蛋，替他挖了坑。「他從容將頭朝下，鑽入坑內，兩脚朝天。」算是無顏見天而整個「荻村傳」，使人低迴良久的那一句話：

「想來想去，這叫做全本「老百姓倒霉大出演」，這臺戲從頭到尾，老百姓演的是全本武大郎。（第一四四頁）」

中國的小說創作，自古以來，有沒有像「荻村傳」，如此合乎「人的文學」的呢？「荻村傳」應是第一部。而夏志清先生却說：

讀章回小說，一直要到二十世紀初年的老殘遊記，我們才碰到一位在專制政治下，真正為老百姓請命，人道主義的作家。周作人在「人的文學」從沒有提到它，想來他覺得劉鶚有些地方，還是舊腦筋。……老殘遊記同杜甫不少詩篇一樣，是真

正人的文學的傑作。（夏志清著「人的文學」）其實，夏先生那篇「人的文學」，縱觀全文，對「人的文學」本身並不太推崇，雖在結論裏，他勉強地說了一句：「人的文學這個觀念，仍是值得我們借鏡活用的。」不過，一向喜歡把文學當作純藝術品去批判的夏先生，能够提出「人的文學」，畢竟是可喜的。夏先生批評周作人把紅樓夢算得上「人的文學」，是一種偏狹。而今，夏先生提出老殘遊記才是第一部真正人的文學，這個觀點，以「偏狹」一詞而言，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吧！

紅樓夢、老殘遊記都不合「人的文學」。不能因為紅樓夢「描寫出中國家庭的悲喜劇」或「研究平民生活——人的生活——的文學」（皆周作人語）就算

是「人的文學」。再說，紅樓夢是研究「平民生活」的嗎？中國家庭，擁有大觀園的，又有幾家？周作人不但是偏狹，而且也「渾身犯下錯誤」，作為知識份子比何索(Heros)還要糟糕。再說，老殘遊記，到底為老百姓請了那些命？也許它有人道主義的色彩，但置之中國人的背景，它只是偏狹的官場諷刺而已。

杜甫、鄭板橋的一些「農民詩」，對於人道主義、農民文學（以農為背景）都多少企及，却是即興式的悲憫，零碎的諷喻，而大多數的詩人，也許只為了表現自己的清高、歸隱意識，以至天下蒼生一番。

即便詩人也能够行而起，不僅止於坐而吟——像徐世昌一樣來一首「聞砲聲有感」，即便杜甫、鄭變，也算是「人的文學」，但也畢竟「太少了」。何況詩與小說，在「羣治」的實際效用裏，其差別是很大的。

一些士大夫文學、貴族文學、宮廷文學、山林文學、酬唱文學、遊仙文學，以至紅樓夢與老殘遊記，在文學的領域，有它不可磨滅的價值，但從未為「人」請過命。直到「秧歌」，直到「荻村傳」，才那樣正視了「中國人」。注入了普通「人」的生命與感情，這是荻村傳的價值。